

石川滋先生采访录：我与中国经济研究

以下记录为采访者（中兼和津次）根据 2008 年 11 月 14 日、2009 年 4 月 3 日及 4 月 27 日在石川先生家所进行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

1. 华北交通（公司）

中兼：采访将以提问的方式进行，请您根据自己的记忆作答。即便某些记忆出现差错也不要紧，因为我可以进行后期修改。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采访吧。首先是有关华北交通（公司）的问题。石川先生从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毕业后，便马上进入了华北交通公司，后来到了军队（现役军人）。那么，您进入华北交通公司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石川：我在预科时代有一位名叫大木穆彦（Oki Mutsuhiko, 1907-）的朋友，他出生于北京，并在北京长大。后来，他进入了朝日新闻社，成为了经济部的一名记者，再后来升为社论副主编副主管。我曾与他有过长期的交往，受到过他较大的影响。但这并非我所受影响的全部。我自己曾天真地相信，日中之间有共存的可能性，并以此为目标展开了研究工作。这真可谓幻想呀。如今回想起来，这应该算是那一时代的特色，大体是一种非正常的环境。此外，我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吧。

大学毕业时，自己有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热情，是去满铁（满洲铁路）的调查部还是去经营区域覆盖整个华北地区的铁路公司（华北交通），两者的比重几乎等同。当时自己有一种希望为日中共存尽一份微薄之力的淳朴想法。我对满铁调查部很感兴趣，加之自己之前便一直关注中国。在当时满铁，包括橘扑（Tachibana Shiraki, 1901-1947）先生等，曾有过多位评论家呀。我认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的讲，在当时深入研究各个领域的成果概要中，《支那问题事典》较为优秀。翻开来一看，其中有植田捷雄（Ueda Toshio, 1904-1975）先生撰写的有关治外法权的内容，我也因此第一次了解知道了植田先生的情况。他曾在我家附近居住过呀。那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记得其中也有橘扑先生的文章。橘扑先生属于满铁调查部的元老。于是，满铁调查部便成了我的选择的目标之一。尤其在其到了最后阶段，我的选择目标变为了两个，或是去满铁调查部，或是去华北交通。两者的比例逐渐扩大，最终我选择了去华北交通。

中兼：据我所知，您在华北交通的工作是从剪票开始的。

石川：是的。满铁和华北交通都以同样的方式对新就职的职工进行培训，让新职工参加为期两年的实习，从事剪票员、车厢（列车段）的乘务员到客车站站长助理等工作。来自专科学校、大学毕业的新职员大约有 200 人吧。当年，在奔赴中国前夕，我们在内原训练所接受了三个月左右的开垦等生存实地训练。内原训练所位于水户附近，来自农村的少年在这里接受集中训练后，便被派往满洲的开垦地区。

其后，我踏进“满洲”，到了位于哈尔滨北部的一个叫北安的地方。那里有

通往绥芬河方向的满铁支线。中途有一个名叫铁岭（译注：原文为铁丽）的地方，那里有满铁的训练所。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三、四周后，第一次进入了位于中国北部的华北交通公司。我被分配到了“天津北站”（客站），不久调到了“天津列车站”（车务段）。按照满铁的方式，新职员将接受为期两年的实习。

我最初做的是车站旅客的工作。车站所谓旅客工作是从剪票开始。接下来，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做客车驾驶员列乘务员。在实习期的最后阶段，即快到满两年时，我开始做货车乘务员乘务员。从满铁时期开始，一直实行的是经过这种两年实习期才能正式进入总公司的培训方式。为接受征兵体检，我中途回到了国内。由于眼睛近视，我被确定为“乙类（合格）”，于1942年3月成了广岛野炮联队的现役军人。

与驾驶相关的工作有很多呀。具体而言，首先要求我们做的是打磨转辙器的前端。所谓转辙器，具体地说，就是转轨设备。要求打磨的就是铁轨的尖端呀。这或许是一种象征性，精神方面的象征性的工作吧。据说，如果转辙器不能移动，列车就会脱轨，所以要求从转辙器的打磨工作开始。接下来是做货车的乘务员。由于要入伍，所以我没赶上做客车乘务员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些人却留下了许多有关“驾驶”货车的故事呢。逐一介绍起来，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在这里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个吧。由于货车的车厢有40节左右，因此，最前面的车头机车与挂在最后的乘务员车厢之间有很长的距离。因此，当列车中途停车时，乘务员便会想：“为什么停车了呢？应该去看看吧。”由于离乘务员车厢过远，乘务员在列车启动后再往回赶，时间就会不够用。我也曾有过拼死拼活地往回跑，最终总算赶上子列车的经历。

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从北京返回的路上。由于前一天晚上在北京喝酒时的酒劲儿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便在乘务员室里，一胳膊搭在桌子上睡着了。按照规定，列车在通过车站时，乘务员必须挥动白旗，但列车过站时，我们却没有挥动旗子。大概是错过了时间吧。总之，事故发生在了一位与我大学同校的一位前辈身上。后被一位身着西装的旅客发现，这位前辈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中兼：是不是当时您睡过了头？

石川：是的，是睡过了头。嗯，还有过很多故事呢。因为这些毕竟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兼：如此说来，您大约在华北交通工作了一年吧。那一期问，您一直在中国吗？

石川：是的，我一直在天津。日本人的新职工宿舍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我从宿舍去北站或设有乘务员区的天津站。谈到乘务员的生活经历，刚开始时很艰苦呀。每天的起床、就寝时间都会有一些变化，起床时间、上班时间不规律，生活节奏被打乱。这比乘务员的本职工作还令人痛苦。

中兼：华北交通的公司职员几乎都是日本人吗？另外，您是如何与中国人交往的？

石川：无论在总社还是在各车务段，也无论是科长还是其他什么人，大都由日本人与中国人搭配，两人为一组。但到了实习现场后，则变为了一个人，而且，我

本想与对方交朋友，但结果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交往呀。在实习现场，工作每隔数月便会有所变更，所以自己希望与对方深交的想法最终也没能实现。同时，也因为时间较为有限吧，我在华北交通的实习现场仅待了一年多。无论是车站的工作还是列车乘务员的工作都属于一人的工作，所以我没有交到朋友。虽然车站里有许多中国人工友，但根本没有时间去和他们交往，因为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变换岗位。结果，连谈话等的机会也很少。现今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

中兼：您在日本也有过与中国人交往的经历吗？

石川：同班同学中有几个人出生于满洲中国的东北，但后来便再没与他们见过面。

中兼：您到了中国后，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否发生了转变？

石川：并没有更多的交往呀。至今仍深深印在脑海里的是，当时北站附近有许多拉洋车（人力车）的车夫。那些人由于营养不良，即使偶然遇到碰车事故时常发生碰撞事故冲突，马上有人也会丢掉性命。曾有过这样的悲惨事件。曾记得他们蜷缩在路边的角落里，身上盖着草席。他们骨瘦如柴，一旦遇到碰撞，便会即刻气绝身亡。

中兼：你的中文是到华北交通之后学的吗？

石川：我是在东京商科大学的最后一年开始学习中文的。学校里有一位很优秀的中国老师。这位老师由上田先生（上田辰之助：Ueda Tatsunosuke, 1892-1956）从北京带来。他让我们把手抵在这里（做以手推动面部动作），上下推动面部，他说卷舌音实际上是这样发音的。就这样，在学了一年左右的中文后，我觉得自己的中文基础发生了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北京人是这样发音的，但天津人则不然。在天津，就连卷舌音也（与北京）完全不同。而且，上海和广东的中文区别更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中文呀。后来，也曾有过学中文、讲汉语的机会，但在出任驻香港记者期间（后面将进行详述），仅只加强了与外国人的关系，尤其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等媒体人的关系，结果全都使用了英语。

2. 关于根岸、村松先生

中兼：下面是有关东京商科大学的话题。从因特网上查询，发现在“一桥学问研究会”的《桥问丛书》第11期中有石川先生的一篇题为“关于一桥的中国、亚洲研究”的文章。文章中出现了谈及根岸先生（根岸佶，Negishi Tadashi, 1874-1971）和村松先生（村松祐次，Muramatsu Yuji, 1911-1974）的内容。文章中有“在战后十年间，我住在镰仓的材木座。根岸先生居住在逗子市的小坪，因此，我曾有机会经常聆听根岸老师的教诲”的描述。关于这一点，您能否解释得更详细一些？您曾在哪些方面受到过根岸先生的影响？

石川：最初，我到时事通讯社入江先生（入江启四郎，Irie Keishiro, 1903-1978）的研究所工作时，根岸先生常来研究所。从开始在报社工作时起，《一桥论丛》

就向我约稿，自己为《一桥论丛》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对根岸先生《买办研究》一书的书评啊。其后，我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五反运动》，这也是应时在事通讯社工作时期应之约而作。总之，就这样，自己与根岸先生的交往是从进在入江研究所开始。（根岸先生）知道我就住在附近，便在散步时常来我家，是个很可爱的先生。先生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呀。因此，我手这里有根岸先生赠送的书，应该是先生的珍藏品吧。这个纸夹里是根岸先生的信，里面写的是鼓励我的内容。他对我一直是这样的。我回到一桥时，他显得十分高兴。

中兼：您是在大学时代受教于根岸先生的吗？

石川：在我的大学时代，根岸先生还是外聘讲师。我这里保存有上根岸先生东洋经济概况课时的笔记。

中兼：如此说来，您在大学时代只是主子当时只上过任外聘讲师的根岸先生的课，并没有什么私下的交往呀。在您的大学时代，村松先生曾担任过教师吗？

石川：根岸先生当时是教师。而在那一时期，村松先生还在军队里。大概是在我读三年级时，他曾有一次回到大学。至今还能回想起当时在国立学生食堂见到松村先生时的情形。记得他一直在部队里服役了很长时间。他曾多次应征入伍，是负责财会工作的军官，大概是中尉或大尉吧。他服役时间真的很长。他与我所主持的研究会的老师高桥泰藏（Takahashi Taizo, 1905-?）先生十分要好，二人大概算是文人相亲吧。（村松先生）曾任汽船部部长，很有名气。汽船部有自己独特的喝酒方式，与普通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一次，我曾被他拽了去，从新桥附近开始，接连去了五家左右的酒馆喝酒。在一处酒馆里只停留五到十分钟吧。这不算没什么，有时，我被叫去陪酒，他却要我“不要再搞研究”，“不要再做学者”了。后来我想，既然他与高桥先生交往较深，是否他传递给我的是高桥先生的意思呢？

3. 同盟通信时期

中兼：接下来，请允许我把话题转到同盟通信时期。进入同盟通信，是在战争结束，您复员之后吗？

石川：虽然说是同盟通信，但确切地说，自己更希望进入的是同盟通信的外电部。之所以希望去那里，是因为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出现了变化，总之，我希望能够对这十多年的形势变化进行考察。为此，我决定去通信社。有一位名叫山中笃太郎（Yamanaka Tokutaro, 1901-1981）的先生，他在同盟通信工作过，曾任过同盟通信巴黎记者站的站长，是上田贞次郎（Ueda Teijiro, 1879-1940）的学生。谈到上田先生的正规弟子，应该首推经营管理经济学界的增地庸次郎先生。同时，由于上田先生也对各种实证学性质的研究有所涉猎，他在这一领域的继承人便是山中先生了。总之，我拿到了这位山中先生的推荐信，便去了同盟通信。松方三郎（Matsukata Saburo, 1899-1973）先生当时任编辑局局长，外信部部长是长谷川才次（Hasegawa Saiji, 1903-1978）先生。这样，我便先见了松方三郎。对方以极其冷淡的口吻说：“像你这种的人最好不要来报社，去做个农民吧。”接下来，我在见到长谷川才次时，他却对我说：“你很像是一个新闻记者，马上来工作

吧。”觉得已经通过了，我便回到了山口的乡下老家。战争结束后，自己一直没回过老家。回到乡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做好各方面准备后，离开老家时已经是战争结束三、四个月之后了。再次来到东京时，（同盟通信）的外信部门已经不再属于共同通信社，而归入了时事通信社。于是，自己便在那里度过了九年的时光。

中兼：您是如何认识山中先生的？

石川：那是因为我的学生时代是在一桥大学度过的。

中兼：如此说来，您是因为上田先生的介绍才认识山中先生的吗？

石川：不是的。我与山中先生相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山中研究会的学生中曾有一位我的朋友。与东大不同，（在一桥）不仅会见到研究会的老师，也会认识其他的老师。因为大学的规模较小吧。因此，自己认识的也不只是研究会的老师。在读预科时期，上田贞次郎先生任预科部主任，我得尤其收到了先生的照顾。

中兼：进入时事通信社后，给您的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石川：在时事通信社工作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入江启四郎先生。他的儿子入江昭现今在哈佛大学。这位入江启四郎先生很了不起呀。

中兼：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吧。

石川：（先生的）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非常之高。先生喜欢喝酒，每晚就寝前一定要温酒自斟。这时，他便会边学习边饮酒，不断地学习新的语言学知识。

中兼：入江先生是您的时事通信公司的上司吗？

石川：是的。入江先生时任时事研究所所长。同时也负责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我被分配到了那里。在研究所里，由入江先生负责处理有关中国方面的新闻。嗯，对入江先生而言，任何国际新闻都会成为他的研究资料啊。我逐渐能够阅读中文，也是那时受到了入江先生的影响，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新闻，当时被称为“电码”，每一个词汇都由四位数字组合而成表示。这些“电码”既有被虫蛀的地方，文章中也有很多漏掉之处。但必须在通读后，将之改写为消息。入江先生当时就手把手地教我做这项工作。我也因此开始能够阅读中文了。就这样，我是在入江先生的指导下才能够阅读中文的。（后来，）入江先生辞去了时事通讯社的工作，去了早稻田大学……

亚洲政经学会成立后，我一直担任该学会的理事。这大概也是因为入江先生的推荐吧。先生是国际法的专家，更是外交史的专家，与大平善梧先生（Ohira Zengo, 1905-1989）、植田捷雄先生（Ueda Toshio, 1904-1975）等同龄，他们一起参与了亚洲政经学会的创办。此外，还有庆应的英先生（英修道：Hanabusa Nagamichi, 1902-1994）及早稻田的老师，总共有三、四人。他们年纪大体相仿。板垣先生（板垣与一，Itagaki Yoichi, 1908-2003）、川野先生（川野重任，Kawano Shigeto, 1911-）等人虽然从年龄上讲，并没有“跨代”，但却属于第二辈人。

我与石川忠雄、卫藤沈吉等人同时成为了下一届的理事。

总之，入江启四郎先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横跨古今内外。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没有哪位学者能够拥有像他一样的优秀品格。《列传体史苑散步》等也只是展现了其研究领域的一隅而已。他的主要著作是《凡尔赛体制的崩溃》，这是他任巴黎支局局长时期撰写的外交史研究的名著之一。

中兼：入江先生似乎出过一部名为《中国古典与国际法》的书。

石川：是的。虽然我不曾认真研读，但这部书也能够体现出先生的特点。

中兼：，石川先生当初从同盟通信社外电部调到时事通信社时，是直接去了时事通信的研究所吗？

石川：嗯，是的。我直接进入了时事研究所。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中文学习。在步入学问之路时，曾受到入江先生的极大影响。我认为，像他一样品格高尚、名副其实的学者并不多见呀。入江先生曾对我十分信任。

中兼：除中文外，您还从先生那里学到了什么呢？说得具体些，如对华观点或历史分析方法等。请您谈谈，自己在对华问题或在学问方法方面是否曾受到过先生的指导？

石川：关于观点嘛，先生坚持的是从政治角度，中立、客观地看待历史的态度。（入江先生的观点）表现为，从某一思想的立场出发，积极展开分析。这与丸山真男等人的风格迥然不同。我认为那是一种大量使用资料，中立的、从因果关系上把握国际关系，再对之进行客观、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因此，即使是在对华观点上，我也能够避免较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当时亲华的有代代木对的亲华派。那曾是一个极易受政治左右的时代。我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站在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上，是因为在出发点方面师从了入江先生这样的人。

中兼：接下来，在时事通信期间，您是于 1951 年被派往香港的吧。据悉听说，您是（日本战后驻香港记者的）首批吧。

石川：是的。我赴港时，日中邦交尚未恢复正常化（1951 年 12 月）。我在那里工作了 17 个月。正如回国后所撰写的报告（“隔帘相望窥望竹幕的 17 个月”，《世界周报》，1953 年 6 月 21 日出版）中所讲，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并整理情报。我曾与许多从中国回港的人及逃亡而来的人见过面。我对平时没能学习学好中文感到遗憾，但从另一方面讲，自己也因此得以（更多地）与欧美各国记者进行了交流。但是，从情报方面讲，我从中国人那里获取的数量相当之多。我与非常多的中国人或可称之为逃亡者见过面。与香港本土的中国人谈话时，受到过很多责难呀。请他们吃饭时，（他们便会谈起）日本人做过哪些坏事……

中兼：您（的报告中）曾有相关记载，譬如，您曾读过《解放日报》、《群众日报》

| 《大众日报》以及《长江日报》等……

石川：最主要的还应该是《人民日报》等中央机关报和《大公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区机关杂志《进步日报》（天津）、《解放日报》（上海）、《长江日报》（武汉）、《南方日报》（广州）。然后便主要是小宣传册的单行本。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记得自己的工作是从如何能够获取情报，从最可信（可信度较高）的报纸上刊登了哪些内容方面的整理入手的。

中兼：如此说来，（石川先生）在香港期间所撰写的文章中，大概不会有关中国钢铁行业的论文吧。

石川：嗯，我不曾记得自己曾单独对钢铁行业做过详细的研究啊。只是，时事通信社与普通的报社或共同通信社不同，必须写一些专业性的小篇幅论文，以供给地方报纸使用。其中，包括《北海道新闻》、《中部日本新闻》、《西日本新闻》等地方大报。由于必须为这些报纸提供这样的特殊服务，自己也因此得到了撰写专业论文的机会。我曾对钢铁工业进行过调查。在时事通信社期间的那些作品，虽然都曾装订成册，但遗憾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已经不知了去向。

中兼：我曾听说过石川先生在那一时期曾认真研读过莫里斯·多布多布（Maurice Herbert 多布，1900-1976）的著作。当听您讲了自己从驻港时期开始阅读多布的著作后，我心中的谜解开了。我认为，石川先生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多布研究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而且非常感兴趣。诚然，他多少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我认为，您大概是通过阅读多布的著作，研究苏联经济及计划经济，继而转向中国经济的研究的吧。事实果真如此吗？

石川：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多布有关苏联经济的著述曾是我研究中国经济初期的范本之一呀。我对俄罗斯研究没有什么自信，但中国虽然最终将步入社会主义，即使中国共产党也会认为其早期的社会变革（与俄罗斯）不同，目的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考虑到中国匆匆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认为必须以俄罗斯为参照物来研究中国。因此，我开始研读多布的著述。

中兼：接下来是有关您与多布的相识及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听说您虽然不曾与他见过面，但曾有过书信往来。我在查找相关论文时得知，石川先生曾于1961年为《经济研究》第三期（No. 3）撰写过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关于多布的中国模型”的论文，而且，多布在一年后为《经济研究》撰文，以“A Note on Professor Ishikawa’s choice of technique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对石川教授‘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选择’一文的说明”）作答。是否可以以此理解，您与多布没有很直接的固定关系？

石川：嗯，最初是通过论文与多布进行对话的，此前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人关系呀。

中兼：是这样的呀。你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因为您撰写了有关“多布的中国模型”的论文，并译成英文寄给多布吗？

石川：大概是由都留先生告知的吧。这件事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当时曾有一个一桥（大学）的毕业生在**多布**所在的剑桥大学留学。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中兼：是宫本义男（Miyamoto Yoshio）吗？

石川：不会是他。宫本义男先生是高岛善哉（Takashima Zenya, 1904-1990）先生的弟子。记得有一天，高岛先生**曾**特意来到我家，他嘱托我说，“请帮我的学生（宫本义男）修改一下译文。”我在读预科期间，曾受到过高岛先生的关照……而且，他一直与对我很好，因此，我不得已便接受了委托，帮助（宫本）修改了译文。但是，我与**多布**的联系是在那之前，**而且曾**有过直接的**交往接触**呀。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却通过书信。与**多布**相比，我与**阿玛迪亚·森**（Amartya Sen, 1933-）的交往更早些。当时我40多岁，他大概**不到**30多岁吧。

中兼：您是因为与**多布**的关系而认识的**阿玛迪亚·森**的吗？

石川：嗯，我和**阿玛迪亚·森**相识并没有通过**多布**。我和**阿玛迪亚·森**相识，是因为自己在毕业于德里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一些印度人中有很多朋友。谈到这一机缘嘛，我想应该是源自自己的英文著作《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Perspective》吧。很多印度人读过我的这本书，尤其是工作在印度新经济学界前沿的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或与德里经济学院有关，或受到孟买大学的农业专家**丹特瓦拉**（Dantwala）的影响。我之所以能够以德里学院为中心，有**拉耶**（K. N. Raj. Chakravarty）等很多熟人，这大都是因为他们读过我的这部书。据**拉耶**所述，他们之前一直在遵循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不太重视实证。记得他们在印度的农业领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性质的研究，曾连续发表在了学术杂志《Economic Weekly》（经济周刊）上。因此，他们在读过我的著述后，发出了“以亚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和经验主义的关联程度竟如此之大”的感慨。此前，即便是与开发相关的问题，他们采取的也是以欧洲经验为背景进行思考的做法。从这一意义上讲，我的这部著述不但阐述了开发问题，而且也给印度经济学家带来了冲击。

中兼：如此说来，您是以这部书为契机，开始了与**阿玛迪亚·森**建立的关系？

石川：对我来说，关于这部书的主要评论有两个。一个是**阿玛迪亚·森**在《Economic Journal》（经济周刊）上发表的书评，另一个是**拉·明特**（Hla Myint 1920-）的书评。他为曾就读的LS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份名为《Economica》的杂志撰写过一篇很长的评论。他在文章中强调，该书展示了作者的新思想，同时亦为“经济发展”与“经验主义”架起了一座桥梁。迄今为止，人们所谈论的大都是“发展经济”或“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人谈及其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我的著述《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Perspective》（1968年）首次将视线投向了经验主义的原点。而且，（在我的书中，）印度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这对许多印度人来说，大概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吧。

中兼：接下来，回到您在香港时期的话题。那一时期，您在中国研究方面是如何

考虑的呢？

石川：在驻港时期，除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从事经济分析的外国记者。从那时起，我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必须以国民收入的周转为中心，从宏观方面展开分析。此前的中国研究都是以社会经济分析为中心的。我认为，（由于革命，中国的）体制发生了变化，不能再继续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自己产生了与村松先生等相左的看法。而且，自己在最初进入一桥大学（，成为教员）之前的工作也是有关国民收入的问题。

3. 与都留重人先生的相识

中兼：您离开时事通信社后，便去了一桥大学。据说您当时是受到了都留重人（Tsuru Shigeto, 1912-2006）先生的邀请。那么，您是如何与都留先生相识的呢？

石川：前面曾提到过，我的朋友中有个叫大木（穆彦）的人，但我与都留先生的正式相识并非经过大木的介绍。我想，（对大木而言，）都留先生是经济部的记者，是重要的采访对象，而且从私人关系上讲，能够给自己一些指导。有一天，我们两人结伴拜访了都留先生。当时，我记得自己曾说过，自己在时事通信社工作时期，便希望对中国有所了解，也可以说，自己最初便是抱着这一想法而进入时事通讯社的。那一时期，自己已经为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机关杂志写过有关国民收入研究的论文。把我引荐给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应该是植田捷男先生。

中兼：是那篇 1952 年发表在《东洋文化》上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量化研究”吗？

石川：是的。这篇文章大概是我研究中国国民收入的最早的论文。见到都留先生时，这篇文章已经发表。我记得，自己曾谈起“自己希望能够从国民收入周转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展开研究”，“自己尚未找到比这更理想的研究视点”之类的感慨。当时，自己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后来有一天，都留先生问我：“你希望到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来吗？”当时，我还未曾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到后来，应该是 1954 年前后，我生病后住进了庆应医院。我觉得，自己当时并非真的生了病，（实际上）是受了蒙骗。我有一个在庆应医院当大夫的内弟，大概是他策划了让我辞掉新闻社工作的骗局吧。他对我说：“不是告诉你，如果还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新闻记者），命将不保呀。”我住了 4 个月左右的院，因为发现胸部有阴影。这令我回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在刚进入东京商科大学预科时，我被选为班级划艇对抗赛的队员。因此，在课程结束后，我们便会从小平出发，乘坐多摩湖线、国铁前往大久保。在从那里打上出租车，6 人合乘一辆。以前的出租车都是福特车。总之，大家就这样挤坐在车里。来到隅田川的舟延，练习划船到傍晚 6、7 点钟之后，再各自返回自己的家。（自己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生活。）那一期间，我曾患过感冒，并发展到轻症肺炎呀。在当时的胸透照片上曾发现胸的上部有阴影，因此住过 4 个月的院。于是，我辞去了时事通信社的工作。

中兼：因此，当都留先生邀请时，您便决定了去一桥大学……

石川：其后便在家养病，共有一年的时间吧。在这一期间，我曾因其他事情（给

都留先生)打过电话。他问我：“我之前所说的那件事，你想好了吗？”实际上，我已经忘掉了这件事。按常理，因为患病在家休养，原本不可能接受邀请，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我经过重新思考之后，最终决定重返一桥大学。因此，回到一桥大学，我并不是由于村松(祐次)或我曾参加过的研讨班的老师高桥(泰藏)先生的劝说。

中兼：一桥大学准备创立亚洲部门，是否因此邀请了您呢？

石川：啊，并非如此。邀请我的是经济研究所，都留先生考虑到我的情况，向文部省提出了创立新部门的申请。在我进来的一年前，这一部门已在管制下成立。这一部门的命名称是“中国东南亚部门”，最早的安排是由我来出任这一部门的主任。由此可以看出，都留先生对我以国民收入为核心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4. 与**柏格森**等人的交流

中兼：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您在美国期间与**柏格森**(埃布拉姆·柏格森, Abram Bergson 1914—)、**埃克斯坦**(亚历山大·埃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1915—1976)之间的交流情况。在我的印象中,(认为您)受到**柏格森**的影响较大,因为您是将柏格森等人的推算苏联经济国民收入的方法用于中国研究。此外,**埃克斯坦**曾对中国全年(1952年)国民收入进行过推算。我认为,您可能因此而产生了将之拓展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想法。

石川：从国民收入的周转情况去解释中国经济,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非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早在学生时代,我便学了宏观分析的方法。在**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后不久,我便参加了高桥泰藏先生(1905—, 1929年毕业于东京商大学, 1961年—1964年任一桥大学校长)的研究会,接受了宏观分析方面的教育。我认为,若想进行宏观分析,尤其是从事实证研究,可以从国民收入角度入手。而且,必须从把握国民收入体系之处着手。

中兼：可以认为,您是因为接受了高桥泰藏先生的宏观分析方面的教育,才决定研究中国国民收入的吧。

石川：在中国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确如此。开始中国国民收入研究,话题或许有些重复,首先要设定中国经济研究的目的,由于中国目前正在处于巨大的体制转型期,革命之前,尤其是战前的很多中国研究不再具有直接的作用,需要全新的时效性研究。为此,考虑到必须从诠释国民收入循环方面着手,于是便独自开始研究。这首先是因为自己曾接受过宏观分析方面的教育呀。而且,即便想从微观方面开展研究,也没有相关的数据呀。

中兼：在您前往美国之前,**柏格森**的研究已经在全球方位内广为人知了吧。

石川：是的。他的研究的确已经为全球所知,但在我的记忆中,**柏格森**的博士论文是有关苏联工资雇佣制度的方面。

中兼：即便记不清年代也没有关系。您是 50 年代在日本接触了**柏格森**的研究后，才决定前往**他**所在的国家留学的吗？

石川：嗯，我前往美国留学（1958 年 9 月～1959 年 12 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的实际情况，见到**柏格森**本人并非我的目的。去见**柏格森**，是因为他是都留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因为有了都留先生的介绍，自己才在抵美后不久便去拜访了**柏格森**。此外，我还见过许多都留先生的其他朋友。**柏格森**向我推荐的是**多马**（Evsey D. Domar, 1914—1997）的著作，（他劝我读一读）**多马**的《*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经济成长理论论文集**》，1957 年，第九章）。第一次与他相见时，他劝我说：“不想研究一下**多马模型**吗？”我想，他当时尚处于未完全掌握的阶段。受到他的话的影响，与其说是开始学习**柏格森**的学问，莫若说是开始准备（对多马模型）进行研究。该书的第九章对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菲尔德曼**的计划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概括，并围绕“**菲尔德曼模型**”展开。作者认为，这一模型是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唯一政策变量，即计划经济当局确定的从国民收入的投资中被分配给投资部门的比例，亦即**伽马系数**的大小所决定的。因此，在开展研究时，**伽马系数**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受着某些因素的影响。我发现，这些因素与储蓄率相互关联。那一时期，由于是**柏格森**的推荐，我便对**多马模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此，如果说受到过**柏格森**的影响，自己的确曾在这方面受到过他的影响。

接下来是有关**柏格森**的情况。他确实曾通过基于 1933 年的前苏联工资结构（Wage Structure）研究发现了与美国的相似之处。我认为，与此相关，他得出了“苏联的劳动市场中运行的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劳动分配”这一结论抑或概念。**柏格森**在战后所从事的苏联国民收入推算，是以实际估价金额标准与从据此得出的实际价格中扣除“间接税减去津贴”的**因素成本标准**这两个基准为基础的。这一结论是从战前的工资结构研究中得出的。他向我建议的并非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国民收入方面的研究，而是“研究中国计划经济中的某些极端环境下的**菲尔德曼模型**”。他的建议并非自己阅读并已经理解，而是类似将新课题交由学生来做一类的建议。我是否也被他视为自己的一个弟子了呢？因此，我也非常想试一试**菲尔德曼模型**的研究。

中兼：您是在哈佛认识**埃克斯坦**的吗？

石川：不是的，我们在香港时（已经认识）。由于我研究的是国民收入问题，于是他也决定写相关的论文。他最初是以匈牙利国民收入测算问题获得学位的，其后，他竭尽全力，对 1952 年单年度的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研究。我想，他这样做，大概是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吧。因此，他来香港见了。在他到哈佛大学的第二年，我也调到了一桥大学……和他的相识，应该说是我们有共同语言吧。

中兼：当时，是**埃克斯坦**来香港找您的吗？目的是什么呢？

石川：他大概是在 1952 年冬季来的香港。那时，我们已经互相有所了解，所以他才到香港来见我的。是呀，我也曾想过这件事，我们究竟是如何认识的呢？总之，那时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学者，因此也就见了面。他当时

参加了麻省理工的**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主持的项目，负责其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部分。**罗斯托**大概是出于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吧。他以中国为主，开展了**罗斯托式**的研究。我在时事通讯社香港分社工作期间，都留先生结束了德里经济学院的讲义，回国途中经由香港，或许他还有其他的事情吧。他前往总领事馆，问了一些有关我的情况后，便准备与我面谈。不凑巧，当时我刚好离开了下榻的饭店，没能见到他。（话说回来，）都留先生在哈佛期间，大概曾向**埃克斯坦**提到过有关我所从事的国民收入研究的事情吧。总之，由于我们之间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埃克斯坦**便首先联系到了我，我也因此得以与埃克斯汀相识。

中兼：**埃克斯坦**不是**柏格森**的弟子吗？

石川：嗯，不是他的弟子，因为他称（柏格森为）“艾布拉姆”（Abram）。在美国，如果是师生关系，学生会对老师的正确称谓应该是呼其第一个名字。因此，（两人）绝不会是师生关系。他出生于密西根。

中兼：**埃克斯坦**是其后去的密西根吧。

石川：嗯，作为学者，他在密西根首次获得了较理想的职位。之前他一直是授课教师，有些不得志呀。

中兼：您在哈佛期间，见过**库兹涅茨**（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吗？

石川：**库兹涅茨**当时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许我在哈佛时，他已经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到了哈佛。嗯，我们曾在研究室见过一面。与之不同的是，**库兹涅茨**倒是多次来过日本。其中，他是为了让大川先生（大川一司，Okawa Kazushi, 1908-1993）完成日本经济的长期统计工作。从某种意义讲，他来日本也是为了催促、鼓励大川先生。**库兹涅茨**曾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这是**库兹涅茨**寄来的信。他在信中说，“请告知你正在从事的中国调查是一个怎样的项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想，他寄信给我，）是想让我做些什么吧。

中兼：我大体上理清了其中的各种关系。**柏格森**给了您研究“**菲尔德曼模型**”及“**多马模型**”的建议后，您从**库兹涅茨**那里受到了有关基于国民收入推算方法的启发吧。

石川：从某种角度讲是这样的。但在中国研究领域，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刘大中（Tachung Liu, 19??-）先生。

中兼：您与刘大中先生在哈佛见过面吗？

石川：嗯，在哈佛研究时期，并没有与刘大中有过什么交流。记得他曾来过哈佛，我同他见过一次面。他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倾向于东洋研究，莫若说是更倾向于儒教研究呀。我曾常与刘大中的（比较年轻的）合作研究者叶孔嘉见过面。记得他曾来过东京，我还和他在什么地方一起吃过饭呢。

中兼：您如何看待曾给您带来启发或影响的**库兹涅茨**的方法论呢？

石川：在这一方面嘛，（与）事先设好理论，再据此进行阐释的**多布**的方法不同。谈到**多布**的研究方法，虽说也属于“增长论”范畴，但却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论完全不同，因为它有理论方面的分析，而**库兹涅茨**则没有相关的分析啊。他是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中提取出某种历史观。众所周知，人们称之为“**高成长长期研究**”（*epoch approach?*）。

中兼：他的书中有“**高成长长期**”这一词汇吧。

石川：**库兹涅茨**认为，所谓“近代**高成长长期**”，是指总括工业革命之前所积累的技术、政治、思想及文化等的“大杂烩式”发展时期。就地域而言，这一“**高成长长期**”其后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断扩展开来。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也从发达国家转向了不发达国家。这便是源自实证研究的近代“**高成长长期**”。大川先生等人对此深信不疑。由一桥经济研究所编写、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日本经济长期经济统计系列》是在大川先生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完成的。他在最终卷的“大川篇”的“国民收入”序言中写道：“贯穿全卷的思想皆基于**库兹涅茨**的“**高成长长期**”理论。这一结论并非征得了大家的同意，而是因为最终卷的序言部分由大川先生负责撰写。其实，负责前面内容的人并没有谈及这是贯通全卷的概念呀。由此可以看出，大川先生是一位“独裁者”呀（笑）。总之，在**库兹涅茨**的思想里，实证研究的结果便是这样的东西。他认为，在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成为了殖民地。他的这段话及其殖民地思想等内容非常有意思呀。因为毕竟这是经过实证的结论。

下面谈谈**库兹涅茨**的方法论。当时，在一次日本的国际会议期间，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渡部（经彦）先生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当问**库兹涅茨**“您的方法论的核心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是分类（classify）。将实证得出的所有结论进行分类。”对于**库兹涅茨**当时的回答，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啊。

中兼：在哈佛大学期间，与您关系特别亲近的人中，一位是**柏格森**，另一位是**库兹涅茨**吧。

石川：是的。但关系特别密切却谈不上。记得无论我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库兹涅茨**都非常认真地回答我。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呀。谈到（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一些什么，应该说是对实证研究的彻底探求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只能这样回答。

5. 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项目

中兼：其后，您是何时与东畑先生（Tobata Seiichi, 1899-1983）开始相识的呢？

石川：嗯，是在什么时候呢？总之，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记得当时东畑先生提出希望设立一处中国研究基地。因此，在经过一年还是两年之后，“日美民间人士会议”在耶鲁大学北边的达特茅斯（Dartmouth）召开。当时，东畑

先生也前来参会。日方出席人员包括我在内有近 10 人。东畑先生是一位喜欢晚上带年轻人一起出去饮酒的人。在一次喝酒时，我当场问了他很多问题。当然，当时提的问题完全不是今天所谈内容的详版。总之，由于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中有三位新人，他便要求我能够给予他们一些指导。在中国部门设立之初的 60 年——大概该部门的研究力量不足——从事政治研究的人中有一人叫德田，但没有让我对德田进行指导。我决定一定还有其他从事中国研究的人。

我最早是何时与东畑先生相识的呢？我 1960 年完成了《中国的资本储蓄机构》，并因此获得日经图书文化奖。当时，东畑先生是审查员之一。（获奖结果）是在 11 月 1 日或是其他时间在《日经》上公布的，而为我的书写审查评语的正是东畑先生。文章虽然很短，但却写得非常之好。（我们最初的相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中兼：很久以前，在东畑先生还任东大农业系教授时，他曾到一桥授过课吧。

石川：嗯，我曾听过他的课。

中兼：当时，您只是在教室的后面听了他的课吗？

石川：是的，因为我只是众多学生之一。上东畑先生课的学生虽然不是 100%，但他的课的确讲得非常好。我记得在有一年九月份的一次课上，他一开始便讲：“今年暑假期间，我读了史密斯的《国富论》”。那是一堂很引人入胜的课呀。也曾听人批评他是“深谙授课之道”。

中兼：接下来，想向您请教有关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的统计研究》相关问题。据说，由于您受到了大川先生他们所做的日本国民收入推算研究的启发，希望自己也能够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的相关（收入推算）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后，是否您将这一工作分派给了东畑（精一）先生？

石川：不是的。记得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希望从国民收入推算的角度解释 1949 年后的中国经济。关于自己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民收入，是在美国时了解了他们的苏联研究情况而受到启发。据哈佛俄罗斯调研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出版的要览所载，战前，美国的俄罗斯研究题目是自由选择的，但到了战后，研究人员开始以俄罗斯调研中心为中心，对论题进行集中筛选。其中有三条主线：第一条是对体制原则、实施原则及计划方针的研究；第二条是对以国民收入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循环的研究；第三条是对各产业部门的增长、劳动市场的形成、农产品的商品化等职能领域的研究。这三条主线构成了俄罗斯调研中心的研究内容，亦即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方向。

我并非一味地对此进行模仿，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总之，我那时开始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必须这样开展。

其后，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时，东畑先生要求我能够培养一些研究中国及研究中国经济的新人。按照他的说法，是要求我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展中国研究。三人虽说是新人，但能力都非常强。与其说是对他们进行培养，我倒认为是自己和他们一道创立了一个日本中国研究的新领域。国民收入部分由我来做，其他各

职能领域或产业部门的研究则由这三人及其他人负责。研究方法与俄罗斯调研中心的俄罗斯研究完全相同，确立了体制的运营方式、宏观方面的国民收入及其周转、各产业部门这三条主线，项目整体属于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我虽然到了一桥，但由于那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自己又必须参加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所以，我在一桥的研究内容与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内容便融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体而言，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内容并不是由东畑先生设定的，而完全是由我与其他三人（尾上、小岛、中兼）讨论后确定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新学科。曾有许多人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包括常磐（常磐绚子：Tokiya ayako）、山内（山内一男：Yamanouchi kazu）等。他们都曾聚集到这里。

中兼：有一点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常磐老师和山内老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呀。为什么让他们两个人参加呢？

石川：我想，两人的动机大概一样，或许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只围绕着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展研究，是无法阐释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的吧。加之，我认为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其中有中国派和代代木派。而且，代代木派中有一些非常温厚的人。我认为，这些人大概发现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必须要学习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方面的知识吧。因此，山内先生加入了研究会。关于常磐老师为何也参加了研究会，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认为，他们的动机应该是一样的。

中兼：这么说来，是常磐老师向您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会的吧。

石川：是的，是由他们两人提出申请的。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参加者只有他们两人。

中兼：我认为，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经济的统计研究》、《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形成了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的基础。

石川：嗯，至少是基础之一吧。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会很大程度上为政治因素所左右吧。

中兼：请您从今天的视角评论一下当时有关中国经济长期展望的研究模型。我认为，虽然一种模型自有其固有的意义，但与现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石川：是的，因为毕竟是现实，中国经济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呀。开始将其资源配置管理等划分为按照计划实施的部分和其他完全无法接触到的部分，应该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的事情。我认为，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动态，虽然理论不可或缺，但不将之只视为研究假说之类至关重要。我认为，首先需要做的是收集好基于长期视角的基础性数据。就最为基本的理论而言，它属于国民收入体系。因此，最为稳妥的方法是从国民收入周转方面进行分析。虽然我并没有强调这是最佳选择的意思，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稳妥且有效的方法。时代不同，其有效性也会随之改

变。所以，如今人们或许更多的是从微观方面开展研究的吧。总之，这是因为变化过于剧烈呀。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一方面事先对国民收入进行归纳整理，另一方面则按部门收集其长期以来的发展数据。我在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已经结束，成果大体有三（《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I、II、III）。虽然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但却是一项效率较高的研究项目。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只是拉入了许多同行，在数字收集方面花了很多时间。

中兼：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中国的相关数据吧。的确，刘大中等人曾希望以粮食生产和钢铁这两个变量来推算中国的GDP。在那一时代，人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如今我依然记得，您在设计这一模型时表示：“这不是一种预测式模型，而是一种瓶颈选择式模型。”如今回想起来，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模型的预测意义呢？

石川：是呀，那算是一次试论吧。不能过分强调客观性。但是，这一模型从设计之初便已经决定了其胜负的一半，因为一旦在“瓶颈”认识上出现错误，便无异于一座空中楼阁。因此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讲，最为安全的做法是从计量方面控制好每一个部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累积。只是当时被视为“瓶颈”的是左右农业核心部门的粮食、雇用及动态方面的投资（储蓄）。总之，如果认为其体制可行，在这样一种没有相应数据的环境和年代里，正确的做法应该走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等传统、安全的模型为出发点，再配以其他具有极大稳妥性的公式，不断进行累积的安全之路。在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年代，依靠这种模型进行研究，也确是迫不得已呀。**伯格瓦提**（**バグワッティ**）著作中的研究方法表现为，采用较为客观的哈罗德—多马式增长公式，以此为基础，并加入直感的瓶颈因素，最后将此三者作为主要变量进行组合。我认为，这是一种以通用公式筛选出的领域为核心，再加进构成“瓶颈”的要素，并以此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式。

中兼：经过数年之后，您在国际问题研究所¹的研究会上曾对该预测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就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譬如，您曾指出：“按照原有的模型，应对边界资本系数予以固化”，“由于制度的原因，实际上存在着边界资本系数增大的问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边界资本系数显示的是资本及投资的效率，所以这一系数受到制度的影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影响经济动向的因素绝非一个，可以认为还会受到许多制度方面的影响。我认为，这一模型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

6. 开发论方面的中国经济研究

中兼：与此相关，我个人认为，石川先生中国经济研究的业绩之一，表现为引进了经济开发论的视点。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迄今的日本“中国通”只是介绍了中国的制度或政策出现的变化，说得极端一些，他们只是对中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我认为，以经济开发论的视点及架构对此进行归纳整理是您的一大特点，也是您的一大贡献。您的这一构想萌发于何时呢？是自您结束美国留学和研究工作之后便强烈地萌发出了这一构想及视点呢，还是在赴美之前的时事通信社时代便有了这一构想的呢？

¹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石川：嗯，这与赴美无关。在美期间，我开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何确立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了解俄罗斯调研中心所开展的俄罗斯研究情况，包括交流活动。有关俄罗斯经济等的俄罗斯研究的基础最早是由**亚历山大·盖尔谢科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04-1978）在哈佛奠定的。其后，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柏格森**（我赴美前夕去了哈佛）也曾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弟子。与哈佛的俄罗斯调研中心设在一处的还有“**东亚研究中心**”（East Asian Center），我应邀成了该中心的“**远东研究员**”（Far Eastern Fellow）。说是“应邀”，我想是由于有都留先生的帮助吧。我的目的是为了专门了解美国的俄罗斯研究现状。

如果按照你的看法，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应该从开发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是因为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经济框架…应该属于那种方法呢？…总之，如果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讲，我认为以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经不再行得通。作为一种解释的方法，与其说是在了解（美国的）俄罗斯研究状况期间学到了可行的方法，莫若说是这些方法萌生于那一时期。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嘛，我的看法是，它表现出了一种转向低开发经济过程的倾向，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加以把握，将无法解释清楚中国。这便是与你方才问题中的“何时、如何萌生”相关的情况。

中兼：这里有收录了石川先生中国研究著作的目录。我翻看之后的印象是，其中有 50 年代初期的有关中国货币管理或中国五年计划的若干特征等内容，如果将之进行归类的话，大都以制度论、政策论为主。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开发论方面的内容。这是否说明，您到了一桥经济研究所之后，在与大川先生等人的接触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启发？

石川：嗯，我认为和这些没有什么关系。我原本就有从国民收入着手研究的想法。关于主要的研究工作，是想将这些内容写进文章里。于是，自己便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展了这项研究。关于那一时期的资料来源，如果说受到过一些影响的话，我想应该是来自美国吧。其一是想从国民收入方面进行归纳，然后再从相应的长期视角对各主要部门的发展进程及现阶段进行阐述。这一项目得到了许多从事亚洲经济研究人员的帮助，包括受到了山内（一男）先生等人的帮助。应该从哪里谈起呢？应该说，我自开始便对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最早由岩波出版的《中国的资本储蓄机构》这本书中也有与印度进行比较的内容。因此，我认为自己从那一时期起便被“卷入”了开发问题里。但这本书是以“**菲尔德曼模型**”为主展开论述的，并在最后一章里与印度进行了比较。之所以自己感到很轻松，是因为“**马哈拉诺比斯模型**”与“**菲尔德曼模型**”大体相同。

中兼：1950 年 2 月，您曾为《实业日本》撰写了“尼赫鲁的印度与毛泽东的中共”这篇论文。我想，您应该是从那一时期起便对印度产生了兴趣。作为一种解释，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如“**路易斯模型**”及“**努尔库赛(ヌルクセ)**模型”等传统经济开发论逐渐盛行开来。我想，在这种大潮中，您认识到自己应该从这一视角去分析中国。路易斯的论文也发表于 1954 年吧？

石川：是的。因为在那一时期，开发论有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呀。

中兼：谢谢您接受我的长时间采访。